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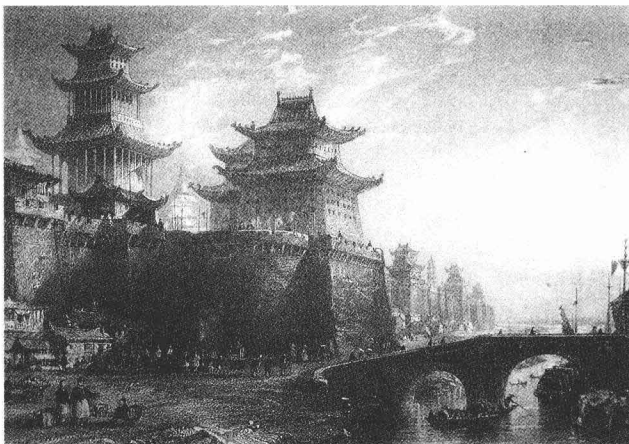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中国文化 西传欧洲史

下册

〔法〕安田朴 著

Etiemble



EUROPE CHINOISE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中国文化 西传欧洲史

下册

[法]安田朴 著
耿昇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法)安田朴著;耿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ISBN 978-7-100-09620-1

I. ①中… II. ①安…②耿…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
史—中国、欧洲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67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上下册

[法]安田朴 著

耿 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620-1

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9

定价: 75.00元

第 二 卷

前 言

那些由于偶然或工作需要而通过本卷接触到我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的人，都非常希望参阅我在介绍第 1 卷时所写的内容。这就是说，如果大家希望像李约瑟在编写他有关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巨著所作的那样，则至少需要 10 年由一个研究小组编好一部有关欧洲向中国借鉴内容之著作的高度概括的大纲。这种借鉴无疑是从希腊文明时代开始，而通过丝绸之路的作用进行的，古罗马的船舶一直航驶到太平洋沿岸停泊，以获得中国丝绸。总而言之，如果想通过长篇大论，试图证明中国传教区的报告和事实上向欧洲提供的有关中国技术、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仅仅希望促进和鼓励这个小组，并渴望他们能使我的著作变得过时无用。我于此仅仅希望证明：18 世纪迷恋中国工艺品的中国热以及中国的音乐、戏剧及科学的某些方面的发现，是怎样无法阻止处于中国热中的欧洲出现一种对华不友好行为，这种仇华情绪在孟德斯鸠身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并由于“启蒙时代”的某些哲学家而发展到了高潮。他们是那种炮舰政策的先驱，正是这些炮舰在英国成功地把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便厚颜无耻地到中华帝国推行殖民主义去了，而该帝国曾在如此之长的时期内丰富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欧洲的思想、科学和技术。因此，大家将会理解，我忠于自己的目的，有意选择了这个“中国化的”或“中国热的”欧洲的某些方面。如果我了解《本草纲目》的历史（中国的这部巨篇植物志是于 18 世纪才揭示给欧洲人的），甚至如果我读到了罗妮

(Elisabetn Rochat de La Vallée)有关该问题的精辟论著^①,那样我就不会再勾勒这一事件的奇特遭遇。如果我怀有那种针对欧洲的每个国家都出版一部俄国人于1969年写的那种著作(有关他们与中国关系的两卷文献和资料,我在第1卷的前言中已经提到了)的奢望,那么我就必须写10卷书,而仅仅为了这一目的,就至少要耗去我一生的20年。仅仅针对英国而言,我可以很容易地把我自己和其他人(如欧文·阿尔德里奇)在这个方面的调查压缩到30多页,即从我发现笛福(Daniel Defoe)提出其看法的时代起,他声称与其祖国和居民相比较,中国为它自己提出了一种如此不利的形象。中国人陈受颐于1935年在天津出版了《丹尼尔·笛福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一文。从此之后,我还看到过有关英国人形成的中国形象。中央帝国奉献给英国人的文化礼物或其他内容的论著。有关18世纪儒教在英国传播的问题,我当然会阅读埃德蒙·莱特(Edmunt Leites)于《第2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年版)中发表的论文^②。

我并没有忽略欧文·阿尔德里奇的论著,他是关心远东亚洲与西方关系的罕见的比较文化学者之一,曾于1986年在《世界文学的再现,亚洲和东方研究》中发表了《启蒙时代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观》一文^③。大家怎能忘记蒲纳德能够在《中国和英国》一书中

① 《中国的药草志于18世纪在欧洲的传播》,载《第3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这次会议于1980年在尚蒂伊召开),美文学出版社,《卡塔西亚丛书》,1983年版,第177—179页。

② 《第2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这次会议于1977年在尚蒂伊召开,美文学出版社,《卡塔西亚丛书》,1980年版,第65—81页。

③ 我感谢他给我寄来了这篇论文的抽印本,编页为第1—25页。此文后来由亚洲—太平洋议会联盟的亚洲—太平洋文化研究中心再版,第14卷,第2期,1986年。

考证出中国对欧洲的所有贡献,其中包括茶叶,它是17世纪初叶由荷兰商人向欧洲人展示的。他毫不犹豫地写道: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我们对这个遥远国度所欠的债。因此,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一种没有茶叶的生活该是多么“无聊”(ennui,这是在英文著作中的一个法文词)啊!蒲纳德也既不会忘记瓷器,又不会忘记漆器,更不会忘记玉、釉。所有这些工艺品在17和18世纪都“越来越多地运往欧洲”。他同样也知道并沾沾自喜地庆幸,中国从来未曾有过“在人类中看到世界末日”那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他无疑错误地思忖:为什么它(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如此无足轻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有时也自相矛盾一些,即他承认,“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来自中国事物的一种狂热追求横扫欧洲,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因此,这就促使他欢呼由毕勒芒(Pillement)于1700年发表的《中国的茅屋》。他却又错误地写道,这同一个充满中国热的欧洲仅仅对孔夫子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认识。早在1691年,确实是在伦敦出版了《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的伦理》一书,但它仅仅是重新翻译了3年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部同名法文书。此外,埃德蒙·莱特还用法文发表了《儒教在18世纪的英国,自然伦理和社会改革》一文,此文后来又被译作英文^①。

1977年的这一届国际汉学讨论会,特别提供了美国研究有关启蒙时代中国的作用以及“启蒙时代对中国的解释”的一份详细书目,尤其是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研究。即使我不完全同意沃尔特·沃森(Walter Watson)的论述,这也是一项任何触及此类研究

^① 《第2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977年于尚蒂伊举行,美文学出版社,收入《卡塔西亚丛书》,1980年版。第51—64页的法文本,第65—81页的英文本,英文本中增加了一些在法文本中没有的注释。

的人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其证据是：我在巴黎大学的最早授课中就曾论述过这一问题，现在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当我在本书第 1 卷中论证了中国是怎样首先是由于耶稣会的传教而从文化上吸引了欧洲之后，现在我于本卷中将勾勒一番从中国热（亲华）到对华不友好（排华或仇华）这种态度转变过程的基本轮廓。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构成了这种对中国矛盾态度的两根支柱。在此，我将尽力阐述《中国孤儿》在欧洲不少国家的戏剧舞台上的发展状况等内容。

如果大家认为，那时文化交流上的东学西渐和“来自东方的豪华”一句话始终都能得到证实，那也是完全误解了思想史。如果说中国人对我们作出了很大贡献，那么他们至少也有一点收获。当然，耶稣会士们为在西方传播中国所做的事要比向中国人揭示西方所做的事多得多。但如果大家把耶稣会士们对中国思想所作的贡献贬低得微不足道，那就是令人遗憾地误解了。韦哈伦（Verhaeren）先生非常仔细地编辑和发表了由北京的耶稣会士们逐渐积累起来的图书馆藏书目录，耶稣会的勒蒂夫（Rétif）神父于一篇叫作《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座图书馆》中评论了这些藏书的价值^①。

北堂的这个图书馆^②积累了耶稣会士们认为有利于他们在华活动的各种著作：“它在这两个互相不熟悉的世界上起到了一种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对于东亚来说，它有助于使人了解欧洲文艺复

^① 大家同样可以参阅《北堂图书馆藏书目录》，于 1944—1949 年由遣使会印刷厂印刷。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参考书目，请参阅荣振华（J. Dehergne）：《震旦大学学报》，上海 1949 年版，第 262 页。

^② “北堂”系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落成，隶属法国耶稣会士。——译者

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于西方来说，它间接地帮助揭示了远东的人类财富。”（上引勒蒂夫书，第 113 页）

圣方济各·沙勿略亲自为该图书馆挑选藏书，他本人于遥远的东方曾致信其长上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是对天文学一窍不通者……你们一定要注意别向日本或中国派遣一名非博学的神父。”稍后不久，有幸实施圣方济各·沙勿略计划的利玛窦神父始终坚持其前任的意图。在每次致信欧洲要求大家帮助他丰富其图书馆的藏书时，他都强调指出，要获得品种尽可能多样的著作。“他就这样希望使其知识臻于完善，并引起与他频繁往来的中国学者们赞赏般的好奇心”。他认为好奇和钦佩这两种心情均为可以将其异教的来访者引向上帝的合乎人情的道路。在北堂的现今藏书目录中，大家还可以发现最早收藏的几本书。该特藏是于 1605 年组建起来的，据某些学者认为是 1605 年 8 月 27 日。事实上，那些与利玛窦神父交往的中国来访者都对这个图书馆感到惊奇，有关天文学、几何学、制表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西文著作与宗教书籍、哲学、伦理或历史著作同时收藏。在利玛窦死后，龙华民神父在某些方面摒弃了其前任的理论，尤其在某些中国玄学概念的意义问题上更为如此，但在北堂藏书的问题上继续他的事业。他虽然并不完全是为了这一目的，但确实也是为了这种目的而派遣金尼阁神父赴法国，尔后携回近 7000 册西文著作，经海路一直运到澳门，然后再经江河道路运输。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该图书馆经过了许多曲折变迁。1644 年，当满族人降服了中国明王朝并火烧北京城时，火灾却未殃及耶稣会士们的藏书，勒蒂夫神父非常高兴地称此为“简直是一个奇迹”。但他不敢称之为“完全是神奇”，因为 1812 年的火灾毁坏了收藏于东堂的藏书，那里当时是葡萄牙耶稣

会士的第二座住院。19世纪期间,形势变得不大安全可靠了,以至于耶稣会士们将他们图书馆中的剩余书籍委托给俄国东正教传教区保管。他们过了32年之后,于1860年又收回了这批藏书。1862年,狄仁吉(Thierry)编制了一份手稿目录,共包括5930卷书。但在17世纪时,一个收藏有7000—8000卷藏书的西方图书馆(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是经过仔细选择而组成的)则可以使人对欧洲的思想、宗教和科学有一种全面的梗概性了解。由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故,我们无法对中国人可能会从耶稣会士们中发现的内容形成一种准确的看法,但我们可以对此形成一种相接近的看法。任何人在获悉大家在该书目中既发现不了培根,又发现不了伯麦(Tacob Boehme)、布鲁诺、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的任何著作时都不会感到惊讶。无论是实证的思想还是外道的奥义,抑或当时会导致被火烧死的合乎理智的严格精神都无助于耶稣会士们的目的。您们也既不要等待路德,更不要等待加尔文。但《为雷蒙·德·赛本德辩护》一书却可以使蒙田进入中国了。大家在北堂图书馆中可以读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遥远先驱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年)、诸如帕拉赛尔斯(Paracelse, 1493—1541年)或是热罗姆·加尔丹(Jërôme Cardan, 1501—1576年)那样的医生—哲学家,诸如乔万尼·比克·德·拉·米兰多拉(Gioranni Pic de La Mirandole, 1463—1606年)^①或者是约翰内斯·雷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年)那样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此外还有其他人:教皇克莱芒八世(1519—1603年)的医生安德烈·赛萨

^① 本处有误,米兰多拉是1463—1494年人,只活了31岁,本处却认为他活了143岁,显然系笔误或印刷错误。——译者

尔班、鲁汶大学的教授朱斯特·利普斯(1547—1606年)或语言尖刻的著名人物洛伦特·瓦拉(1407—1459年)以及彼埃·德·拉哈姆等”的著作。埃拉斯谟本人被列于目录中了,此外还有勒费费尔·德塔普勒斯(Lefèvre d'Étaples)。勒蒂夫神父也告诉我们说,该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登录的著作“都被注释和校正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此外,耶稣会士护教著作的大部分不是依靠哲学家们而是依靠学者和技术人员的。在天文学、数学、医学、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藏书几乎向中国人推荐了西方所产生的全部精华成果。中国人以一种同样宽宏大量的态度欢迎所有关于航海、建桥以及制造浑天仪的著作,同样也欢迎制造自动机器和碾磨的技术著作,一直到初级电力知识。这一切都对那些善良的神父们有用。“为了上帝的更大光荣!”

大家很可能更喜欢知道,我也依然坚信——大家以后在中国从事的认真研究可以使人发现该图书馆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或指导了中国人的科学和思想方向。对于现时来说,我们将被迫仅限于猜测。我们仅仅知道,穆斯林和汉族的天文学家们并不是由衷喜欢接受这种迫使他们改革历法(因而也改变了宇宙的秩序)的外来科学。最为妙趣横生的是为了获得对于不信基督者的这种胜利,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曾致信伽利略,在答应为他保密的情况下,要求他为他们的利益而计算某部汉文著作记载的某次日食的时间。那些受到教会责贬的人的这种活动该是真宗的多大胜利啊!教廷就是以这种真宗的名义刚刚宣布谴责这位学者。如果我非常了解情况的话,那就是伽利略的学说在1612年才为中国所知。1614年,阳玛诺(Manuel Dias)神父于其天体的解释中非常巧妙地强调了这种理论。同年,耶稣会总会长

禁止其耶稣军传播伽利略有关天体性质的理论。这些善良的神父们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为了使他们的宗教能够赢得中国，他们必然向中国人推荐一种要大大优于穆斯林们（回回）的那种天文学，但现在耶稣会长禁止他们使用最有效的武器。至于我们这些曾阅读过《省会长》一书的人，可以猜测到耶稣会士们会诡谲地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在北京观象台中使用了阳玛诺神父的论著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在正式场合下，他们只会宣扬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仅仅到了1865年，天主教传教区才向中国人宣布了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最后胜利，恰恰就是在我们的炮舰也向中国人揭示了我们文明的另一种表象之时。一些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中国人于是便对中华帝国实行改良，当然又重新刊布了利玛窦神父于1607年亲自用汉文翻译和发表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几何原本》）的前6卷。我很喜欢研究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迷恋，这是利玛窦神父及其继承人所取得的唯一真正胜利。这确实就是不久之前西方的捍卫者之一康有为的解释：“外部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绝对必须向外看，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观察而改革内部。中国现今的软弱出自它持续了数世纪的系统的闭关自守。全民族都快窒息死了。挣断锁链吧！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吧！……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向我们提供了第一幅世界地图，他们向我们解释天体星辰的运行，改革了我们的历法，在我们这里创建了慈善事业以赢得小民的同情。”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和汤若望则都是耶稣会士。

仅仅是北京的图书馆无疑不会取得这样的成果，因为当时只有很少的人能阅读法文或拉丁文著作。但是就在他们组成这个图书馆的同时，耶稣会士们又用汉文发表了许多科学著作的译本，或

者是他们根据这些著作亲自用汉文撰写的原著。从17世纪起,祈尔歌神父便编制了我们的神父们用以增加中国教堂藏书著作的第一种目录(见其有关中国著作的第158页和以下几页)。考狄(Henri Cordier)编写的《由17和18世纪的欧洲人在中国撰写的著作书目》已载于勒鲁(Leroux)于1883年发表的《东方论丛》第495—546页中了。大家同样还可以参阅《从方济各·沙勿略逝世到1872年间为在中国传教而由耶稣会的神父和修士们撰写的著作目录》(巴黎第1版,上海再版,卡瓦洛1873年版)。考狄的书目远不全面,但它已经提供了由欧洲人在与我们有关的时代于中国出版的近200部著作的书目。

自从考狄的《书目》发表以来,各种著作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知识,尤其是《1513—1688年间欧文著作的汉文编译文》,载《辅仁学报》(1945年,第1—57页和第309—388页),其中第14—15页附有参考书目。耶稣会士高龙鞏(A. M. Colombel)的《江宁传教史》,石印本,上海版,第1册,第567—587页;裴化行:《林塞的第一个科学院和中国》,载《马可·波罗研究》第2卷,上海版,第3期,第21—34页。由耶稣会士们发表的著作现在已不再仅仅是200部的数目了,据学者们认为则应为300部,甚至是363部。大家怎么能希望我们会知道所有的这些著作呢?这些著作中的许多种都用汉文传播了基督教的教理和教义。继此之后或甚至就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仅仅通过孔夫子而诅咒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某些儒教徒,并为了仅仅仰仗耶稣—基督名义的教会而抛弃孔圣人。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还介绍说,耶稣会的毕方济神父用汉文发表了一部《灵言蠡勺》,由于缺少一种完全相当于天主教有关“灵魂”(âme)的思想,这位善良的神父没有发现任何比把“灵魂”经汉文

化而称之为“亚尼玛”(âme, 译言灵魂亦言是性)更恰当的了,这仅是对拉丁文 anima 的一种近似的译音。然而,一名曾阅读了这部《灵言蠡勺》的宗王如此神奇地被那名耶稣会士用来表示灵魂的“亚尼玛”这三个汉文方块字惊呆了,他作为灵魂存在的一种证据而举出了他(一名中国人)对于被武断地拼凑起来表示灵魂的三个方块字的绝对不理解。自称为“常公爷”的该宗王因此而皈依三天主教。这确实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相当奇怪的作用。因此,中国人有关基督教灵魂的思想并不比马勒伯朗士形成的有关“理”和“气”的思想更正确多少。

事实上,尽管康熙颁布了容教的圣旨,并于 17 世纪末允许中国人自由地从事基督教活动并给予了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的许可证(票),天主教在中国依然只取得了很少一点进展。耶稣会士们在那里则主要是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面貌出现的,他们一直如此。为了使新入教的教徒们支持天主教,他们毫不犹豫地用基督教的花体字刊印了欧几里得几何定律的汉译本(《几何原本》)。他们非常富有理智地假定认为中国人在不可抗拒的几何定理的吸引下一定会认为基督教信仰的真谛也显然是正确的,因为这同一批人——耶稣会士们可以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二者。因此,耶稣会印制了大量有关数学、宇宙论、解剖学和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利玛窦神父除了其有关宗教虔诚的著作之外,还发表了一部《几何原本》,即《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的前 6 卷(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新特藏第 2959—2960 号),后来又发表了《同文算旨丛编》(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新特藏第 3304 号)。熊三拔神父也竟然肯用汉文写了一部《泰西水法》(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新特藏第 3209 号),金尼阁神父也传播了对数,邓玉函神父撰写了一部《远西奇器图说略》以及一

部《人身概说》。另一名耶稣会士则以一部《西方问答》和一部《西学凡》而出名。艾儒略(这里确实是指他)神父同时写成了这些著作并撰写了20多部护教著作:一部教理书、一部有关弥撒的论著(《弥撒祭义》)、一部有关忏悔的论著(《悔罪要旨》)、一部有关作者本人与一名中国官吏对话的著作(《口铎日抄》)。然而,如果拉摩特·勒瓦耶称孔夫子为“东方的苏格拉底”,那么中国人似乎也使艾儒略神父有幸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这是一种颇有意义的相互称呼的特征。我们既不应忘记南怀仁神父,更不应忘记汤若望神父,正是这些数学家—天文学家们在中国宫廷中为了法国和欧洲的利益而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他的主持下用拉丁文在北京出版的大量天文学论著之外,南怀仁神父还用汉文发表了一部《仪象志》,甚至还发表了一部《验气图说》。至于汤若望神父,他在中国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涉及了数学和天文学。他在用汉文撰写《远镜说》时也不认为是背叛了基督。汤若望神父的天文学百科全书(有关这一问题,现存有裴化行神父的一篇很精辟的论文,载《辅仁学报》第3卷,1938年,第1—2册)在中国历法的改革中起了巨大作用。对于耶稣会士们在绘制中国地图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我们同样还有许多话要讲。^① 1655年,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国新舆全图》,这是利玛窦和金尼阁神父的一次胜利。稍后不久,巴多明(Parrenin)神父从事了一次对中华帝国内地和鞑靼地区的地理测绘,中国的所有区域地图都根据康熙皇帝的钦命而由杜德美(Jartoux)

^①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王泮、梁辘和利玛窦论1593—1703年的中国地图学》,由米歇尔·德斯东布(Michel Destombes)著,载《第3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这次会议于1980年在尚蒂伊召开),美文学出版社,《卡塔西亚丛书》,1983年版,第46—62页。

神父作了协调工作。大清王朝从这一时代起就已经对俄国人在远东的野心表现出了惴惴不安,由此而爆发了继此之后的战争以及这次战争的和约——尼布楚(涅尔琴斯克)条约(1688年)。如果说康熙特别关注了解有争议的地区和勘定边界,那么这也再正常不过了。他除了要求西方耶稣会士之外还能要求谁向他提供有关位于中国和里海之间辽阔地区的资料呢!1727年,在一位俄国使节来访期间,康熙的第十三子以大臣的身份为其兄雍正效劳。他召对了宋君荣(Gaubil)、冯秉正(de Mailla)、巴多明和徐日昇(Perreyra)诸神父,并命令他们绘制一幅位于黑龙江(Amour,阿穆尔河)、北冰洋和东海之间地区的地图,此外还绘制另一幅一直到达圣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和俄国地图。次年,依然是根据皇帝的钦命,宋君荣神父编制了一幅“一面是与俄国相毗邻的省份,另一面是亚洲的土耳其、波斯和鞑靼地区”的地图。我在裴化行神父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些资料。(《论16到18世纪末中国及其附近地区科学地图的绘制阶段》,载《辅仁学志》第1卷,第2册,第428—477页)他针对这个问题补充说:“使中国人感到惊奇的是看到了欧洲在何种程度上了解远东。”

当中国思想以某些误解为代价对欧洲施加强大影响的时候,基督教仅仅对大清王朝的文化界施加了很少一点影响。这就是谢和耐那部力作所证实的内容,我在本书的第1卷结论中已经参照了这部著作:《中国和基督教,影响和反应》^①。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伯希和在《安菲特立特号船首航中国》中完全正确地写道:

^① 伽利玛出版社,《史学丛书》,1982年版。(中译本: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这种理解事实上是一种误解。康熙对传教士们表现出了浩荡皇恩,这是因为他希望确保利用他们的科学知识,传教士们从事学术事业,以获得一种可以使他们发展其布道使徒职务的权威,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主要的任务,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次要的了”。

绝非我独自一个人持这样的观点:始终是根据相互的解释而确立本来应该称之为“文化交流”的内容。这里是指欧洲在中国的影响或中国在欧洲的影响,而且也往往是我所介绍的那个“亚尼玛”(灵魂)的故事为它定下了基调。

作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1卷的结论,我提到了培尔曾写道,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可能是行得通的,而且更进一步说它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哪里呢?当然是在中国了!难道传教士们不是向我们喋喋不休地宣扬这一切吗?

且听下文分解……

因此,现在就是其下文了。这部著作的下卷更主要是不大协调而不是使人觉得能立见成效的。我们从莱布尼茨开始,他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表率,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普遍价值。但当我们触及到孟德斯鸠时,则会觉得从顶峰一落千丈。孟德斯鸠至少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明星,此人是1748年于日内瓦出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名著的作者。一切都失去了平衡,现在拉布雷德(La Brède)男爵开创了一种对华不友好或排华的倾向,这种倾向在18世纪中叶左右尚很薄弱,但逐渐却壮大了其力量并导致马戛尔尼(Macartney)的出使,一些众所周知的开放思想家们开始攻击这个著名的帝国。据耶稣会传教士们承认该帝国具有的道德来看,它本来可能会成人类的一种榜样,并在许多方面成为表率。